

1506

湖坊文史資料選輯

第七輯



潍坊文史资料选辑

第七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潍坊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九一年八月

目 录

九十回顾	范子遵 (1)
辛亥革命在寿光	寿光县政协文史委 (36)
辛亥革命在高密	于天助 (52)
辛亥革命时期安丘记事	张公制 (62)
寒亭区早期同盟会员的活动及影响	张道路 王安贵 (70)
诸城辛亥独立始末记	孟方轴 (86)
隋理堂与诸城辛亥革命	隋灵璧 (91)
忆诸城辛亥举义片断	王立廷 (101)
我在诸城辛亥独立前后的经历	戚文山 (106)

诸城辛亥独立人物传略

.....栾凤功等 (111)

潍县中国同盟会

.....陈慕虹 (130)

辛亥革命先驱刘冠三

.....于天助 (144)

忆先祖父刘冠三

.....刘明禅 (159)

陈干与辛亥革命

.....黄季陆 (168)

陈干与青岛震旦公学

.....马庚存 (170)

记我父陈干公

.....陈季雅 (179)

寿光县辛亥革命人物事略

.....县政协文史委调查整理 (195)

辛亥革命烈士赵象阙传

.....李哲吾 (211)

从王朝举人到革命党人

——记同盟会会员刘金第

.....刘秉信 (223)

刘大同

.....张乐圣 王融农 (230)

王訥

.....安丘县政协文史办公室 (237)

王林肯生平简介

.....于天助 (243)

王乐平

.....厉保津 (268)

同盟会员侯芝庭先生

.....刘树璠 (273)

挥泪话严君

.....裴 源 (288)

辛亥革命后群众思想意识的转变

.....于沅伯 (301)

九十回顾

范子遂

我于1893年5月1日，出生在山东诸城县范家车村（今属五莲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里。父亲范楸芳，有土地二十亩，我兄弟姐妹八人，两姐两妹，兄弟四人。我最长，也最幸运，读书直到大学毕业。二弟范煜璧，读过三、四年私塾，曾参加广州农民讲习所第六期学习，后回家开中药铺。三弟范煜玫，未读书，自幼务农。四弟范煜瑛，黄埔军校二期毕业，不幸在1930年蒋、阎、冯大混战中阵亡。

学生时期——读书与革命

1900年，我七岁，开始在本村读私塾。十四岁的时候，父亲要我辍学，改学织布。因为我坚持要继续读书，经再三恳求，才得父亲应允，到王家楼子姑母家，同表弟王均甫一起，跟姑丈

王季龙（清举人）读书。两年后，即1909年，又经姑丈介绍，到牛家官庄小学读书。1911年，十八岁，小学毕业。

在牛家官庄读书期间，我的大表兄王乐平（即王者塾）在济南高等学堂读书。他在假期回家的时候，常向我和表弟灌输孙中山先生推翻满清，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革命思想。有一次他同一个叫陈干的剪发青年一起回家。陈向我们讲剪发的意义。他说：猪尾巴（发辫）是满清逼迫汉人留起来的。要革满清的命，就要割掉猪尾巴。在此期间，老同盟会员商震先生也曾来诸城讲学，任教于诸城东门文庙内的东吴公学，宣传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理想。在王、陈、商诸人的启发和影响下，我和表弟也逐渐萌发了革命思想，并决心成为一个革命者。

1911年农历腊月下旬，诸城仁里革命党人臧汉臣和王柞桢（号心源）、王露（号心葵）臧文山、钟孝仙等人，响应武昌起义，夺了清朝县政府的权，宣布诸城独立。并派一叫臧建初的剪发青年来牛家官庄小学，宣传动员青年参加革命军（学生军）前往县城，保卫诸城独立。我和表弟王均甫当即剪掉发辫，参加革命军。因为县城已被由沂水来的清军包围，我们被阻城外。腊月二

十四日，清兵攻入城内，大肆逮捕屠杀革命党人和学生军。革命党人县长臧汉臣被杀害，并被悬首城门示众。我因剪发，亦成为搜捕对象，回牛家官庄小学也呆不下去了，乃星夜赶回范家车村，装假发辫后，被父亲送到院西村外祖母家；又由外祖父送到日照县汪崖村，一王姓基督徒家，躲了一个多月。

1912年4、5月间，姑丈把我和表弟王均甫送到济南大表兄王乐平处，要他资助我俩继续读书。当时因济南公费学校不招生，经表兄介绍，我在一个朱姓家里教了几个月的家馆（教三个孩子读书），到了暑假，表弟王均甫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我考入青州农业职业学校蚕桑班，一年后毕业，又考入青州师范。此时正值济南留日预备学校招生，因该校对参加辛亥革命的青年优先录取，随即放弃青州师范，经王乐平介绍，考入留日预备学校乙班，学习日语。

1913年3月，革命党人宋教仁在上海被袁世凯派特务杀害。黄兴、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等四都督发动了讨袁的“二次革命”（“癸丑革命”）。留日预备学校的学生，也发了通电，表示拥护讨袁。当时的山东都督周自齐惧怕学生闹事，乃托词战事形势混乱，决定解散该校，但答

应形势稳定后学生回来，仍可官费上学。“二次革命”失败后，我和表弟王均甫回诸城，表兄王乐平则逃往甘肃。

1914年4、5月间，我又同王均甫返回济南，考入济南第一中学。在中学读书期间，因原先深受上海宋教仁主办的《民权报》和《民主报》的影响，对孙中山的革命学说和蔡元培、吴稚晖等的无政府主义的文章都很喜欢。1915年《新青年》问世，在它的影响下，对西方的民主与科学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1914年7月，经王乐平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时年二十一岁。

1915年冬，袁世凯在美、日帝国主义支持下，复辟称帝。孙中山在日发表《讨袁檄文》，号召国人起来讨袁。蔡锷、唐继尧首先响应。在云南宣布独立，组织护国军讨袁。1916年3月，山东革命党人吴大洲、薄子明等人，起而响应蔡、唐的讨袁护国运动，在周村成立护国军，宣布周村独立。我与徐文建的儿子（忘其名）一起，离开一中，去周村参加护国军，被任为交涉员，主要担任胶济铁路上、下车行人的检查工作。同年六月，袁世凯病死。我亦深感吴军纪律太坏，而离开周村，又返回济南一中，继续读书。

1917年暑假我中学毕业，考入北京高等师范

学校就读，到1921年8月毕业。在大学读书期间，深受美国杜威、英国罗素、德国柏格森等人学术思想的影响。“五四”运动前，在校曾参加过无政府主义的活动。组织工学会，出版《工学》，宣传“工学主义”。提倡读书、工作、劳动并重，完全自由，不受学校制度的限制。要求学校让工学会会员在校学会一门技术，我学会了石印术。1917年冬，俄国的“十月革命”爆发，马列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当时我认为共产主义和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大同世界同样好，但不如三民主义更适合中国的国情。

1919年5月4日，一个以反对“巴黎和约”为导火线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怒潮，在全国人民中，象火山一样爆发了。这一天，北京各大、中学生数千人，群情愤激，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还我山东”等革命口号激励下，纷纷结队前往天安门集会，游行示威。我和高师同学一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高呼口号，发表演说，反对北洋军阀政府代表在“和约”上签字。学生的游行队伍受到了残酷的镇压，大批学生遭到逮捕。但北洋军阀的暴行，不仅更激起学生们的愤慨，而且激起了全国各界人民的义愤。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为抗议军阀政府逮捕学

生，宣布辞职。上海、天津、武汉、长沙等全国许多城市工人、学生、商人，相继举行了罢工、罢课、罢市。有了全国人民的声援，学生的斗争更加坚决。北京学生联合会决议，定于六月三日到五日三天，各校学生分头上街、作抵制日货的宣传，见到出售的日货，当即烧毁。六月三日，我和高师同学一起，上街发表：“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演说，被军阀政府的军警逮捕，押解到北京大学法科关了起来，前后约一个月。当时被关押在北大法科的学生约有千余人。在全国人民的声援下，最后军阀政府不得不释放被捕学生，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并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三个卖国贼的职务。“五四”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由于我在运动中到处游行、讲演，串连，活动频繁，劳累成疾，后来回家休养了一个多月才好了。

从国共合作到国共分裂

1921年暑假，我在北京高等师范毕业后，返回济南，在省立第一中学担任教务主任。是时，王乐平在济南组织“齐鲁书社”，宣传新文化，推销进步书刊。并以书社为据点，联络各地知识分

子和进步青年，在青年中起了很大的鼓动作用。济南一师学生王尽美，第一中学学生邓恩铭等人，都深受其影响，并积极参加了书社的活动。同年王乐平因革命屡屡受挫，苦于救国无术，乃与王尽美，王昆生（号象五）等人一起去苏联进行考察。并参加了列宁召开的东方各民族会议。亲自聆听了列宁关于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对英、美、日德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土地制度的教导。

1923年8月至1925年9月期间，王讷任山东教育厅长时，我被任为省视学主任，同时还兼任济南第一师范和第一中学教员。1923年8、9月间，曾代表山东教育会赴昆明出席全国教育会议。

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孙中山先生于1923年冬发表了改组国民党的宣言和党纲草案。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政策。并于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了有共产党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纲、党章和改组国民党的具体办法。会议决定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从此开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王乐平出席了大会——他为了让我长期留在山东做掩

护工作，怕我暴露身份，所以没有让我出席这次大会。会后他受大会委派来山东筹备成立国民党山东省党部，我被推荐为筹委会委员，后正式当选为委员及常务委员，委员共十一人；王乐平，于洪起，于恩波、阎绶春、陈名豫、蔡自声、王子壮、孟民言、丁君羊（号基实）延白真和我。王乐平为主任委员，丁、延两人是共产党员。

1925年冬，王乐平受到军阀张宗昌的缉捕，离开山东去北京，后又转广州。这时我对省党部就负着较多的责任。1926年1月，我去广州出席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回山东后，也因为身份暴露，于三月去了武汉。1926年10月，我又代表山东省党部，出席了在广东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和各省、市党部代表联席会议。

从孙中山先生倡导国共合作，到他1925年3月在北京逝世，这一段时间，我同共产党的合作共事关系是好的。自孙先生逝世后，国共之间的关系就从三个方面，逐渐加大了矛盾：一、在宣传三民主义还是共产主义的矛盾；二、在组织上，青年国民党员参加共产党同国民党对吸收工人入党有矛盾；三、在领导权上有矛盾，即共产党的跨党党员和国民党员争夺领导权的矛盾。当时虽存在这几方面的矛盾，但因军阀张宗昌督

鲁，极端残害革命党人，大敌当前，为求共同对敌，我总是力求缩小和缓和矛盾。

在国民党中央委和各省、市党部代表联席会议期间，中央委员、青年部部长丁惟汾和宣传部长顾孟余，数次邀集郭春涛、邓飞黄和我（可能还有童冠英）谈话。主要谈国共合作问题。他们认为国共合作不是永久的，总有一天要分裂。但不是最近，可能在打倒北洋军阀以后。要大家有思想准备，以免将来被动。顾孟余特别强调过早分裂之不利，有为反动势力乘机而入的危险。他们还谈了中央准备派郭、邓去冯玉祥部队作政治工作的问题，郭、邓均表同意。顾孟余并谈了汪精卫、蒋介石将来一定会合作的问题——这时汪精卫在国外，是被蒋介石借中山舰事件驱逐出去的。在我离开广州回山东前，顾特别向我打招呼，要我路过武汉时，把国共将来要分家的问题，转告王乐平。自此之后，我瞭解了国民党中央准备和共产党分裂。返济之后，地方军阀对革命党人的血腥镇压，更变本加厉。省党部交通员史德金和朱锡金两同志，被逮捕杀害。关于国共将来分裂之事，我仅和王子壮、孟民言谈了一下，没再声张。

1927年2月，我离开济南去武汉，途经上

海，遇到路有于^①自南昌回京。他告诉我，蒋介石坚持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自广州迁至南昌；汪精卫等主张迁武汉。并说丁惟汾和顾孟余的行动也不一致，丁来南昌，顾去武汉。我经南昌时去看丁惟汾，他告诉我国共分裂的局势来得很急，顾去武汉，有他自己的打算，我不得而知。又说：王乐平也在武汉，并要我去看看他们。我到了武汉，先见了王乐平和顾孟余，向他们汇报了山东的情况。他们都要我留在武汉，住青年会。1927年3月10日，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了二届三中全会。出席这次会议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多数。会上纠正了二中全会所提出的整理党务案，并就提高民主、防止独裁，把一切权力集于党的原则作出决议。会议还免去了蒋介石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主席的职务。1927年4月，汪精卫自海外回国，他先在上海和陈独秀发表联合宣言，主张国共继续合作；后到武汉，以“革命的向左来，不革命的滚开去。”的极左面貌，骗取了人们的信任，窃取了国民党的党政大权。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背叛了革命，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进行了大屠杀。并在南京另组了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对抗。此即所谓蒋、

汪宁汉分裂。

在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影响下，山东省党部也发生了变化：两个国民党委员王子壮、孟民言去了南京；共产党委员丁君羊来到武汉。丁来武汉后，即酝酿改组山东省党部。由组织部主任秘书陈君埔（当时汪精卫兼组织部长）和丁君羊共同商量，进行山东省党部的改组。丁任主任委员，其他委员有王象五、王志超、王少文、陈鸾书、延白真等人。自此，我就正式脱离了山东省党部。我写信给宣传部长顾孟余，要他安排我的工作；他即派我到中央宣传部担任干事。这时大约是1927年5月初，记得当时在宣传部工作的，还有赖特才（秘书长）鲁佛民（共产党员）、朱斐、戚报捷等人。

当北伐军攻克河南之后——大约也是1927年5月间，顾孟余带我去河南一次。顾去河南的主要任务是拉拢冯玉祥支持武汉国民党反对共产党。因当时郭春涛在冯军内任政治部主任，邓飞黄也在冯军内从事政治工作。顾在同郭、邓和我三人的一次谈话中说：武汉国民党现在处境非常困难，蒋介石调动军队包围了武汉；帝国主义的军舰麇集武汉江面，武汉受到国内外军事上的威胁和经济上的封锁；国共之间的合作关系已

不能维持多久；郭也就冯的反共态度作了介绍。之后，冯玉祥于一天清晨天未亮时，单独约见了顾孟余，两人谈了些什么，我不得而知，其结果正是冯玉祥支持武汉国民党和共产党分裂。这时王乐平在武汉受到一部分山东左派青年的反对，不敢公开露面，也经顾孟余介绍来河南，任省党部举办的国民党党务训练班主任。该班的主要任务是训练国民党骨干，到县、市党部作反共工作。

1927年6月10日，冯玉祥召集郑州会议和汪精卫会晤。六月十九日又召集徐州会议同蒋介石会晤。这两个会议对于促使蒋、汪合流，一致反共起了重要作用。徐州会议之后，冯玉祥还打电话给汪精卫，催促他早日和共产党分裂。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在武汉召开了所谓分共会议，公开背叛了孙中山的革命道路。分共会议不久，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匆匆东移，合并于南京国民党，人员也很快向南京去了。在武汉设了政治分会，作为领导湘、鄂、豫三省的机构。政治分会先由顾孟余负责，我为首席秘书。后顾离开武汉，改由邓寿铨（唐生智的人）负责。在顾负责时，他曾要我和他一起批阅文件（约二、三次）

武汉国民党背叛革命之后，汉口特别市党部